

李商隐

诗选评



新
世
纪
古
典
文
学
经
典
读
本



刘学锴 撰
李 翰

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商隐

诗选评



新

世

纪

古

典

文

学

经

典

读

◎ 刘学锴 撰
李 翰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商隐诗选评 / 刘学锴, 李翰撰.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12

(新世纪古典文学经典读本)

ISBN 7-5325-3494-4

I. 李... II. ①刘...②李... III. 李商隐(812~约 858)—唐诗—文学评论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 第 072030 号

新世纪古典文学经典读本

李商隐诗选评

刘学锴 李翰 撰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56 1/32 印张 7.75 插页 3 字数 164,000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5325-3494-4

I·1643 定价: 15.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 64063949

导 言

提到李商隐,人们自然会立刻想到他那些幽婉深情的《无题》诗,唇舌间自然会涌出“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春雨》)这类忧伤、执著而美丽的诗句。李商隐诗给人的印象,确如春蚕吐丝,缠绵委曲,一往情深;又如红楼隔雨,凄艳迷离,绵邈隐约。

李诗的这种特色,与诗人的个性气质、人生遭际以及时代的政治、文化环境等有很大关系。李商隐家境清贫,幼年丧父,悲剧性的家世出身对其优柔内向、多愁善感的个性气质的形成,当有不小的影响。李商隐的主要活动是在唐文宗大和至唐宣宗大中年间,朋党倾轧、宦官擅权、藩镇割据,是这一时期政治的显著特点。李商隐本有“欲回天地”之志,却不幸逢末世,昏昧的时代不惟不给他提供施展抱负的舞台,还让他在党派倾轧中饱受诋毁挤压之痛,《乱石》诗形象地写出了诗人的处境:“虎踞龙蹲纵复横,星光渐减雨痕生。不须并碍东西路,哭杀厨头阮步兵。”庙堂无其立足之地,只得依人作幕,郁郁终身。当他无奈将一腔情思由外在的功业声名转向内在

的春恨秋悲,也就不是等闲的“伤春复伤别”(《杜司勋》),而是在其中寄寓了深重的块垒忧愤。

李商隐心境的矛盾苦闷,就其小而言,即前面提到的“才命相妨”、贵志难申的沉沦之悲,一直梗塞固结在他的心头;就其大而言,是对末世苍凉的呼吸领会,这使其迷惘苦闷往往越过具体情事,弥笼天地之间;就其最直接的现实性因素而言,则身陷党争的漩涡,内外交煎将诗人逼进苦闷抑郁的深谷:一边是自己仰慕的政治家,一边是自己的恩主之后;一边基于对政治的独立判断,立场上倾向李德裕,一边从个人前途与家室生计出发,又不免屡屡向令狐绹陈情。两者的对立冲突,始终困扰着诗人,犹如重茧乱丝,剪不断、理还乱。不惟个人现实命运在党争中淹蹇沉沦,诗人行事也被党人纳入党争的视野,于是物议纷纷,强加诗人以种种品德上的诬责。面对内外交困、精神与生活两个层面的重压,性格内向优柔、执著而又不善自我排解的诗人,只能将这些痛苦默默埋在心中,独自咀嚼,终至越酿越浓,越积越深。朱鹤龄说:“义山阨塞当途,沉沦记室,其身危,则显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则庄语不可而谩语之。”(《笺注李义山诗集序》)李商隐诗的曲折吞吐,正是其阨塞沉沦中心灵挣扎的声音。那份深重抑郁的苦闷,那种千回百转、纠葛纷纭的思绪,必然导致诗意的隐曲绵邈。而苦闷心境由直接现实处境触发,联及身世沉沦之慨,再广而泛之对世情人情、时世国势出以悲凉体认,则这种悲慨与苦闷眼角眉梢的种种寓含,越发浑融而难以指摘了。

敏感而纤柔的个性,使李商隐诗歌选材,大多亦为纤柔细小之物,如其咏物诗所习咏的蝶、蝉、莺、柳、泪、细雨等,即多具纤柔之特性;再如他对那些柔弱美丽的女子,如女冠、歌伎、

宫女等,常常倾注特别的柔情与同情。而坎壈身世、漂泊生涯,又使商隐对眼前之物、之人每多情绪色彩的渲染。他关注莺、柳等纤柔之物,而且写的还多是寒蝉、流莺、秋柳、残阳,特别注意外物悲凉伤感的一面;他关注青春寂寞的女冠、声色事人的歌女,感情也大都倾注在她们悲剧性的身世命运上。所有这些,都是诗人孤寂飘零的身世之感与眼前之物、之人感应激发的结果。“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而以人观我,则“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因此秋柳残阳、薄命红颜,都特别容易引发诗人心灵的感应。

从本质上说,李商隐是一个纯粹的抒情型诗人,无论状物、写景,还是咏史、酬赠,他的诗歌基本都指向自我的心灵世界。诚如诗人所自称的“巧啭岂能无本意”(《流莺》)、“深知身在情长在”(《暮秋独游曲江》),既为流莺,就不得不临流巧啭,此身有情,就不得不发为歌吟,出发点是情牵恨绕的“情身”,而归宿又回到此情长在的此身。倾吐心中的情感,表达心中的“本意”,锦瑟无端,千回婉曲,不绝如缕,不过是“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白居易《琵琶行》)。当然,诗歌本为抒情性极强的文学样式,一切优秀的诗人也都是抒情的圣手。如李白,喜则“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怒则大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三首·其二》),极其真率任情。但李白的抒情与具体情事联系较紧,只要弄清诗人的行止踪迹,就能明白其喜怒的具体所指,能明确探知诗人情感的因由脉络。比较而言,李商隐的抒情则虚泛而隐晦得多。他因物兴感,其感触虽常由一点生发,但在抒情过程中渐渐混合、链结多重人生感受,淡化具体情事,而扩展为对整个人生、

世情的浑沦认知与复杂感慨。比如《落花》一诗,就交织着身世飘零、年华消逝乃至国运衰颓等种种复杂无奈的哀感,触绪纷繁而又不名一端,如仅解为“悼亡”、“身世之感”、“寂寞之景”等感慨中的某一种,都不免因过于坐实而有所偏执。商隐《潭州》诗云“今古无端入望中”,《锦瑟》诗又云“锦瑟无端五十弦”,所谓“无端”,便是《落花》这类诗中所体现的触绪纷繁而又不名一端、愁牵恨惹而又不知从何而起的浑杂感慨,便是所谓“宋玉无愁亦自愁”(《楚吟》)的“无愁之愁”。

愁而不知何以愁,只觉得满目皆愁,这种抒情特点,简单地说就是略事取情,因而更显纯粹与主观。李商隐以自己悲剧性的态度体察外物,物的自然属性及传统内涵均经由诗人个性化的渗透与改造。如牡丹向为富贵之花,而商隐笔下却是“先期零落”、“玉盘迸泪”(《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其二》);菊性高洁傲霜,而商隐之菊却是“几时禁重露,实是怯残阳”(《菊》),别具优柔感伤色彩。商隐体物的悲剧性、主观性特征,除了特别容易被本身即具悲凉情调的事物打动,再有便是在这类并非一定具有悲凉情调之物中发掘悲凉,但这都是先将外物悲凉化之后,从而咀嚼其中的悲情。有时甚至不须经过这种悲凉化处理,如“鸥鸟忘机翻浹洽,交亲得路昧平生”(《赠田叟》),由鸥鸟欢洽而生世态炎凉之感;“花明柳暗绕天愁,上尽重城更上楼”(《夕阳楼》),花明柳暗,春光明媚,但不妨心头依然浓愁萦绕。诗人既能顺着写,也能逆着写,相应的情景让人忧伤,相对的情景同样也让人忧伤,悲景伤心,乐景也伤心,正所谓伤心人别有怀抱,此恨不关风与月!更多时候,商隐是通过意境的营造,来传达复杂深沉的感慨与隐约幽微的心绪,意境即是对自然环境最主观化的处理结果,是心造

之境，意造之境。《无题》诸什中蓬山万重的阻隔，金蟾锁香般掩抑而不绝的相思，雪月瑶台下可望而不可即的怅惘等等，都是以不落言诠的诗境来抒写心灵。

以心造境，以境写心，形象总是大于思维，李商隐诗也就以此展开丰厚而又含蓄的意蕴，既旨趣难求，又提供了无限阐释的可能。李商隐诗的旨趣难求，是很少有诗人能出其右的。这一方面是他略事取情，混合人生各个阶段、各种情境下的多重感受，诗作缘起本就模糊，诗之作意自然也就难以明晰。商隐诗意常常歧见纷出，不少便与此有关。另一方面就是诗人内心的复杂苦闷、矛盾困扰直接影响了诗意的明晓畅达。以心造境，心绪之纷繁连作诗人自身也难以理清，则又何来明朗直白的诗境。不过，文似看山喜不平，诗更是如此，曲径通幽只会使它愈发魅力无穷。

从艺术手法上说，商隐诗意隐曲，与其跳跃性的思维，意识流式的写作方式，一任情感自发运动，有很大关系。当然，这根本上还是其诗歌的主观性、抒情性所决定的。《燕台诗》可作这方面的典型。该诗惊采绝艳，却又纷繁难解，便因诗人舍事取情，并以感情运动作为诗歌脉络。因此诗的章法结构便随诗人的感情流程，忽而回忆，忽而想象；忽而昔境，忽而现境；忽而此地，忽而彼地；忽而闪现某一场景片断，忽而直抒心灵感受……显得断续无端，来去无迹。从叙事角度看，似极为错综变幻，而从感情变化发展的流程看，却又极为自然。再如《锦瑟》所构筑的庄生梦蝶、沧海珠泪、暖玉生烟等图景，彼此独立，并没有结构或叙述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完全是诗人以自己的心绪与联想将它们连缀在一起。表面上看，一个图景到另一个图景，毫无理由和逻辑可言，但内在庄生梦蝶之“迷”、

杜鹃啼血之“怨”、沧海遗珠之“恨”，暖玉生烟之“虚”，是有情感转换的脉络的，结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更以“惘然”一词笼括所有图景，使这些看似断裂的画面都能集中到统一的主题之上。这种艺术手法上的特点要求在读商隐诗的时候，必须牢牢把握其情感的基调，把握情感的线索与诗人意识跳跃流变的脉搏。

当然，作为唐代第一流的大诗人，李商隐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李诗的风格也不仅仅只是隐曲绵邈。《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深广的写实精神，足可与杜甫的《北征》、《咏怀五百字》相颉颃；《韩碑》之奇崛，置于韩集中足可乱真；《海上谣》、《无愁果有愁曲北齐歌》等冷艳奇诡，又酷似李贺……和一切大家一样，商隐也是“转益多师”，并最终突破前人，形成自己的风格。

李商隐也不是只一味沉湎于自我的忧伤，仅注目于个体的心灵，且不说其伤春伤别中的深广寓含，就其诗歌的题材本身来说，同样也是非常广泛的。除了《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他如《隋师东》指斥朝廷平藩不力，《有感》、《重有感》对时政的干预、评论，《寿安公主出降》愤王室不振、屈辱和亲等等，现实性都十分突出。商隐的咏史诗，更有不少借历史讽喻现实，表现了诗人热切的现实关怀。

商隐的个性，也不仅仅只是优柔内向、多愁善感，《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中那个“狂来笔力如牛弩”、“横行阔视”的狂士，《自况》中那个“谁将五斗米，拟换北窗风”的狷介高人，和我们所习惯的伤春伤别的李商隐并非二人。同样，商隐耿介激烈之吟，也所在多有。如“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安定城楼》）、“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欲问渔阳掺，时无祢正平”

(《听鼓》)等等。商隐赠、哭刘蕡诸诗,更是写得慷慨激昂,血脉贲张,正是诗人基于这种个性中刚烈的一面,所表现出的惺惺相惜。所有这些,都说明无论为诗还是为人,商隐都不是单一平面的,而呈现出丰富的立体多面性。不过,个性的优柔内向,诗风的绵邈隐约,毕竟是李商隐的主要方面,是其特色所在。

本诗选以李商隐生平履历为经,将其诗歌约略分为三大阶段,其中大中游幕虽不过十余年,而作品较前期总和还多,且辗转幕府经历较为复杂而阶段性亦颇明显,故于大中期再分三小阶段,以清眉目。另有诸多名篇不敢遽断作年,为避免遗珠之憾,仍择善而录,附为一编。俾读者诸君论其世而读其诗,读其诗而知其人,知其人而悯其情,悯其情而益知其诗。如能闻寒蝉而感身世,见流莺而念飘零,对斜阳而惜光阴,临蜡炬而体深情,则千古锦瑟,或可稍免寂寥。不怨身无彩凤双飞翼,但求心有灵犀一点通。是所望焉。

目 次

编者的话	1
导言	1
一、幼年飘零到受知令狐(812—837)	1
初食笋呈座中	4
富平少侯	6
随师东	8
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	10
夕阳楼	11
燕台诗四首	12
柳枝五首 有序	17
重有感	20
曲江	23
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	25
自南山北归经分水岭	29
行次西郊作一百韵	31
二、入幕泾原至秘省正字(838—846)	41
安定城楼	43

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	46
东南	48
凉思	50
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	52
马嵬二首(选一)	53
玉山	56
蝶(初来小苑中)	57
出关宿盘豆馆对丛芦有感	59
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	60
咏史	62
无题二首(选一 昨夜星辰)	64
灞岸	65
春宵自遣	67
落花	69
寄令狐郎中	70
北齐二首	72
三、大中幕府飘零期(847—858)	75
(一)桂幕往返(大中元年三月——大中二年九月) ...	78
离席	80
梦泽	82
晚晴	83
访秋	85
宋玉	87
潭州	89
楚宫(湘波如泪)	91
摇落	93

楚吟	95
陆发荆南始至商洛	96
(二)薄宦长安与卢幕从军(大中二年九月——大中 五年九月)	98
钧天	101
骄儿诗	103
流莺	108
野菊	110
漫成五章	112
哭刘蕡	116
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	120
板桥晓别	125
房中曲	128
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宴作	130
(三)梓幕五年至病逝郑州(大中五年十月——大中 十二年冬)	132
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	136
利州江潭作	137
杜工部蜀中离席	138
二月二日	141
初起	143
写意	144
杨本胜说于长安见小男阿衮	146
夜雨寄北	148
即日(一岁林花)	150
柳(曾逐东风)	152

天涯	153
无题(万里风波)	155
筹笔驿	158
重过圣女祠	160
正月崇让宅	162
隋宫(紫泉宫殿)	163
咏史(北湖南埭)	166
风雨	168
锦瑟	170
四、未编年诗	174
无题诗	175
无题(照梁初有情)	175
无题(紫府仙人)	177
无题二首	
(凤尾香罗)	179
(重帏深下)	179
无题(相见时难)	181
无题四首(选二)	
(来是空言)	183
(飒飒东南)	183
咏史诗	186
骊山有感	186
贾生	189
王昭君	191
咏物诗	192
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	192

李花	194
细雨(潇洒傍回汀)	195
秋月	197
城外	198
霜月	199
女冠诗	201
碧城三首(选一)	201
银河吹笙	203
嫦娥	205
爱情诗	207
昨日	207
日高	209
春雨	211
代赠二首	213
暮秋独游曲江	215
其他	217
官辞	217
访隐者不遇成二绝	218
谒山	220
一片(一片非烟)	222
滞雨	223
乐游原(向晚意不适)	225

一、幼年飘零到受知令狐

(812—837)

李商隐(812—858),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商隐出身于中小官僚家庭,其父李嗣做过获嘉(在今河南)县令,在李商隐三岁时,李嗣罢官入浙东幕府,商隐随父寄身幕府,直到十岁那年父亲去世。

商隐聪颖早慧,在《上崔华州书》中,他自述“五年诵诗书,七年弄笔砚”,文学启蒙以及初次进行创作尝试都很早。十六岁即写出了《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樊南甲集序》),一时才名颇著。令狐楚因之聘其入幕为巡官,特加优待,这一年商隐不过十八岁。

聪慧的孩子一般都比较早熟,洞达世情,心性敏感;而这种孩子假如适逢家庭不幸,其敏感的心性对世情的体认会更为深刻,并往往伴有悲剧性的体验。李商隐的童年可以说是不幸的,且不说自幼随父幕府飘零,尝尽寄人篱下的滋味;即使这样辛酸然而有幕可依、骨肉相守的岁月也不得长久,十岁那年父亲不幸去世,商隐一家陷入更悲惨的境地。在《祭裴氏姊文》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童年生涯:“浙水东西,半纪漂泊。

某年方就傅，家难旋臻，躬奉板舆，以引丹旌。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既祔故丘，便同逋骇。生人穷困，闻见所无。”生活的艰难过早地降临到商隐幼小的肩头，为了生存，他“占数东旬，傭书贩舂”，移家洛阳郊外，给人抄书或服役，小小年纪便体味到世态的炎凉。

一个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其早期的生活经验至为重要。也许正是童年生活的不幸，铸就了商隐多愁善感、略带忧郁的灰色性格基调。他对生活中悲剧性的因素尤为敏感，那些柔弱无依、流离漂泊的事物，如流莺、蝉、柳之类，常常是商隐诗中习咏的对象。这当然与其自身远幕依人的漂泊生涯有关，但商隐对这类事物的体察入微，那份物我浑一、灵肉相依的深情贯注，乃其本性在这类事物中的复元返本，这就是先天个性气质所致了。

正因其自幼便历遭浇薄之世情，流离中饱尝世情炎凉，故商隐特别渴望亲情、友情的温暖，特别的多情、重情。因此，当大和三年(829)，令狐楚聘其入幕，并亲授今文，待其如子，知遇提携之恩便足以让商隐铭感终身。他深情地回忆这段生活：“每水槛花朝，菊亭雪夜，篇什率征于继和，杯觞曲赐其尽欢，委屈款言，绸缪顾遇。”(《上令狐相公状》)其实，他一生的幸与不幸，也正是在此时悄悄注定了。受知令狐楚，对商隐流落飘零的早期生涯是一个结束，而对其日后坎坷蹉跎的命运则刚刚是个开始。不过，在这段时期，商隐自己是感觉不到这一点的。他正忙着读书、科考、交游、恋爱，正踌躇满志地规划着美好的未来。

商隐性格优柔内向，然而志向却非常远大。《才论》、《圣论》二文今佚，其中所论不得而知，但从时人的赞誉中可约略